

## 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排字韻》笱記

高田時雄

2001年11月，慶祝潘重規教授九五華誕暨研究敦煌學一甲子的學術研討會在臺灣舉辦。席上，敦煌研究院的彭金章氏在介紹新刊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sup>1</sup>的同時報告了新發現的文獻及其價值<sup>2</sup>，亦有言及此《排字韻》之處。彭氏認為新發現的殘片是《廣韻》以後的一部重要的而現已失傳的韻書，記得筆者對此提出過這大概是《禮部韻略》的一種的意見。其後在端詳該書所載照片時，注意到該韻書殘片的内容其實與有名的王文郁的《新刊韻略》完全一致。對照附載的圖版，這個問題一目瞭然。拙文在指出其一致性的同時，也想記下關於發現該殘片的意義的若干要點。

關於這個新發現的韻書《排字韻》，已有張金泉氏的一篇論文<sup>3</sup>。張氏分析了《排字韻》的兩葉殘片，得出以下兩個結論：（1）具有一百零六韻的組織，（2）是《廣韻》略本之一種。這個結論確係事實，沒有甚麼異議。然而張氏文中所述的幾個觀點亦非完全無可置疑。例如，既談到從《廣韻》的二百零六韻到《平水韻》的一百零六韻的大約200年間的演變過程，又指出“此200多年又值西夏統治敦煌時期。西夏攻占沙州在宋景祐三年（1036年），早《集韻》成書僅三年，西夏滅亡在宋寶慶三年（1227年），僅晚《平水韻略》成書四年。史載西夏統治機構設置模倣北宋，可見敦煌出現雕版《排字韻》，自有其社會，政治的環境”<sup>4</sup>，還在別處說到“《排字韻》可理解為排字之韻略。排字者，排字整齊以利查檢，一也；排列詞語備採擇，二也。韻者，韻略。其書有異于官頒《禮部韻略》，係地區性平民所用之書”<sup>5</sup>。如此則《排字韻》就成為西夏時期在敦煌民間印刷通行的韻書了。張氏拘泥於該殘片發現於敦煌的事實，結果議論似乎偏離了目標。敦煌發現的印刷品中，雖然印刷於敦煌者並非完全沒有，多數是由中原帶入的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專就韻書而言，至今尚未發現一件可以斷言印刷於敦煌者。恐怕西夏時期敦煌沒有印刷韻書之事。看來北區石窟發現的書籍多是元代之物的情況似亦未被充分考慮。

北區石窟發現的《排字韻》是刻本的兩葉殘片，版心分別有“排字勻五 八”、“排字

<sup>1</sup> 彭金章、王建軍編，文物出版社，2000年7月。

<sup>2</sup> 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新發現的文獻及其學術價值〉，《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年），頁63—73。

<sup>3</sup> 〈莫高窟新出土的古韻書《排字韻》〉，《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頁151—160。

<sup>4</sup> 前引文，頁154。

<sup>5</sup> 前引文，頁156。

韻五 九”，可知是第五卷入聲的第八葉、第九葉。每半葉有十三行，每行等距離地排列五個被注字使其出現在相同高度的位置上。王文郁《新刊韻略》的第六葉背面至第八葉正面與此基本相當。《新刊韻略》也是每半葉十三行，由於未採用排字的形式，葉數少了一些。正文的內容完全相同，這一點已在開頭談到。包括注釋、反切、又音、重添字在內，文字全部一致。除了是否排字的重大差異，形式上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其相同點首先在於同用的韻部之間用魚尾形的記號加以區分，例如鏑韻、薛韻。祇是八點、九屑等一百零六韻的韻目部分，《新刊韻略》以黑底白字表示強調，《排字韻》並不如此，其用左白右黑的小圈劃分各個小韻倒是非常有特色的，特別明顯地反映了《新刊韻略》與《排字韻》的繼承關係。

王文郁《新刊韻略》的現在所知的唯一版本是，台灣的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的藏本<sup>6</sup>，由過去的張鈞衡（1872—1927）、張乃熊父子的適園歸於中央圖書館<sup>7</sup>。從印記可知此前是西拉木稜瑞誥<sup>8</sup>、之前又是怡親王家的安樂堂<sup>9</sup>的藏書。然而《新刊韻略》的這個版本以外尚有黃丕烈所藏的一個版本為人所知。清代後半期，學者們利用的卻是黃丕烈的這個藏本以及被認為依據此本的影鈔本<sup>10</sup>。錢大昕於嘉慶元年（丙辰，1796）初次看到此本後附上跋文。咸豐四年（1854）歸於山東聊城的楊氏海源閣的一個版本中據信有“士禮居”、“復翁”的印<sup>11</sup>，因此大概就是黃丕烈舊藏本<sup>12</sup>。但海源閣不幸於1929年至1930年間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土匪占據劫掠，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可以想像《新刊韻略》恐怕又受此劫難而消失。

《新刊韻略》卷首附有河間的許古道真的金正大六年（1229）的序，卷末又有“大德丙午重刊新本 / 平水中和軒王宅印”的牌記。因此可知此書先刊行於金代，元大德十年（1306）重刻 並且卷首的“御名廟諱”以英宗碩德八剌為今上皇帝，故此書是至治年間（1321—1323）的重印本<sup>13</sup>。平水的地名使人立即聯想到的是平水人劉淵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正如顧炎武的《音論》引《韻會舉要》的目錄云“依平水劉氏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併通用之韻為一百七韻 劉氏名淵壬子是宋理宗淳祐十二年，自元至今詞人相承用之”（卷上），毛奇齡《古今通韻》謂“今世所傳詩韻非沈約韻，亦非唐韻，乃宋南渡後江北劉淵所作而自元迄明誤用之者”（論例），此書被認為是開闢了通往後世《詩韻》道路的韻書。而且“壬子”年是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

<sup>6</sup> 《國立中央圖書館金元本圖錄》（中華叢書，臺北，1961年），頁97—98。

<sup>7</sup> 據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張氏的適園幾乎所有藏書於民國三十年十月以七十萬圓的價格賣給中央圖書館（頁207）。民國三十年張乃熊《苕園善本書目》中載有此書，據信刊於民國五年的《適園藏書志》中卻無“新刊韻略”之名。因此《新刊韻略》是張鈞衡晚年或至乃熊之代纔藏入適園者。

<sup>8</sup> 瑞誥，字鳳倫，號悔公。滿州正黃旗人，監生。生平不詳，然可知於清末擔任廣東鹽運使司運同之職。卷首的題記有“宣統三年七月白露節悔公識于潮州醴廡蕉夢室”，證實了其經歷。

<sup>9</sup> 怡親王是以康熙第十三子允祥為祖的王族，“安樂堂”是其藏書樓之一。此外尚有“明善堂”、“樂善堂”，以收藏之富聞名，同治年間流出民間。又有“史鍊厓”的藏書印，由其蓋印位置判斷，可見為藏入安樂堂以前的收藏者，惟不知何許人也。

<sup>10</sup>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7著錄了黃丕烈藏本。此外著錄影鈔本的藏書志有《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抱經樓藏書志》、《鄭堂讀書記》、《皕宋樓藏書志》等多種，可見流傳之廣。

<sup>11</sup> 楊紹和《楹書偶錄》卷1“金本新刊韻略五卷三冊”。

<sup>12</sup> 據《楹書偶錄》，入手時已失去四、五兩卷的後半廿餘葉，錢大昕跋與黃丕烈跋俱無，未斷言是否確係著錄於《愛日精廬藏書志》的書。但難以想像黃丕烈收藏過此書兩部。

<sup>13</sup> 錢大昕〈跋平水新刊韻略〉，《潛研堂文集》卷27。不過《文集》缺跋文末尾“嘉慶丙辰五月望日竹汀居士錢大昕識”的紀年，有必要據《愛日精廬藏書志》、《楹書偶錄》所引補足。

(1252)，一直被看作南宋的出版品。然而嘉慶元年看過王文郁《新刊韻略》的錢大昕，從早在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問世的 24 年前一百零六韻的《新刊韻略》已經刊行一事，推想劉淵的書或許是王文郁書的翻刻本<sup>14</sup>，同時進一步對劉淵是宋人的看法表示懷疑<sup>15</sup>。劉淵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現已失傳無從得見，但《古今韻會舉要》以此書作為“平水韻”使用，故可知其大凡<sup>16</sup>。而近年甯忌浮氏，對宋、金、元各時代的《禮部韻略》系統的韻書進行透徹的分析，對“平水韻”也持續展開周密的論證，完全證實了錢大昕的假說<sup>17</sup>。甯氏首先從《韻會舉要》中揀出注有“平水韻增”的 438 字，確認了這些字基本上完全見於《新刊韻略》的相應之處。又指出《新刊韻略》中注有“重添”等的字亦見於《韻會舉要》中的“平水韻”，而且兩者的注釋一致。《韻會舉要》推崇《集韻》的反切，所以從諸家韻書增入時，往往將原有的反切換成《集韻》的反切，這種傾向很強。從“平水韻”增入的小韻中，有 7 個小韻不僅與《新刊韻略》的反切一致，連小韻的排列順序、注釋都相同，不能說是偶然。甚至有《韻會舉要》所引的“平水韻”沿襲了《新刊韻略》的錯誤的情形。這些都暗示了“平水韻”與《新刊韻略》是相同的書。甯氏進一步指出，《韻會舉要》所引的“平水韻”即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與《新刊韻略》同樣不避宋人的廟諱，主張劉淵不可能是宋人。如此，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是王文郁《新刊韻略》的翻刻本的論斷已是難以動搖的結論。如說尚有些許不安的話，就是《古今韻會舉要》的“凡例”中“江北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稱“江北”的問題，相對於《新刊韻略》有一百零六韻，《壬子新刊禮部韻略》的韻反而增加為一百零七韻的問題，這兩處可能受到指摘。然而，第一個問題的“江北”可以解釋為“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的對舉，此處的江北應視為相對於江南的泛稱，山西的平水也無疑是廣義的“江北”。至於一百零六韻反而增加為一百零七韻的問題，初看顯得不可理解，但正如屢經指出的那樣，這是因為相對於《新刊韻略》將拯、等韻併入上聲二十四迴韻中，劉淵將拯、等二韻作為上聲二十五獨立出來，根據四聲相配的觀點謀求與其他聲調的一致。《新刊韻略》將拯、等二韻併入迴韻，是因為拯、等韻中加上新添字二字也僅有六字，勢必成為極其狹窄的韻部的緣故。可以說劉淵的態度是與此相對，根據音理追求原則的。但《新刊韻略》的上聲二十四迴韻中注有“拯等同用”，如果這是金元的功令<sup>18</sup>，那麼不予遵從的一百零七韻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未能得到社會的支持，不久就消失的命運也是無可奈何的。另一方面，王文郁的一百零六韻《新刊韻略》的系統，作為遵照官韻者得以廣泛流行可以說是理所當然。莫高窟北區發現的《排字韻》亦為王文郁《新刊韻略》的一個版本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實際上屬於這個系統的“韻略”，此外尚有流傳，而且多得出人意料。

<sup>14</sup> 〈跋平水新刊韻略〉：“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

<sup>15</sup>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平水屬之劉淵，毋乃誤耶。且使淵而果宋人也，在稍通古今者，豈有慕於元海之名而效之耶”。（《潛研堂文集》卷 36）

<sup>16</sup> “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併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古今韻會舉要》第一卷韻目後注）

<sup>17</sup> 甯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中華書局，1997 年）第四章《〈平水韻〉考辨》。第二章〈《禮部韻略》考〉、第三章〈景德《韻略》與《新刊韻略》〉也有必要一起參看。

<sup>18</sup> 王國維〈書金王文郁新刊韻略張天錫草書韻會後〉、《觀堂集林》卷 8。

如上所述，莫高窟新發現的殘片採用了所謂“排字”的形式。這是為使用者的便利而考慮的版面設計，當然必定出於民間出版商的創意，可以說是坊刻本的富有特色的形式。與莫高窟發現的殘片相同，符合“排字韻”的名稱者，現存元統乙亥（1335）建安呂氏會文書堂《文場備要排字禮部韻註》以及其覆刻本的至正十二年（1352）徐氏一山書堂刊《文場備要排字禮部韻註》。前者是日本的內閣文庫藏品，後者藏於台灣的國家圖書館<sup>19</sup>。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各排六字。台灣的故宮博物院尚有楊守敬自日本帶去的稱為《魁本排字通併禮部韻註》的一個版本<sup>20</sup>。此本每半葉十二行，每行排列七字，版式與《文場備要》本稍有差異，版本卻沒有差別，基本上可視為相同的書。無論《文場備要》抑或《魁本》，雖然版式不同，分韻、注釋則皆沿襲王文郁《新刊韻略》，並進行增字。今將《新刊韻略》與《文場備要》本之間的異同，就開頭的東小韻及同小韻比較如下。

新刊韻略 東，凍，蝮 / 同，仝，童，僮，銅，桐，峒，筒，瞳，罝，幢，筩，潼，瞳，侗，酮，雍，種 / 計 21 字

文場備要 東，凍，蝮，【凍】 / 同，仝，童，僮，銅，桐，峒，筒，瞳，罝，幢，筩，潼，瞳，侗，酮，雍，種，【瞳，𠵽，網，術，鯛，鱣】 計 28 字

【 】中的 7 字是增補的文字，可以看出其附加於各小韻的末尾。觀察《新刊韻略》的重添字與新添字在《文場備要》本中如何處理，可見並未明示“重添”、“新添”之類，而是編入正文。不過沒有併入同一小韻，仍舊留在末尾的位置上。試舉一例來說，《新刊韻略》原來在（八黠韻內的）轄韻末尾有“𠵽，無愁兒，孟子，為不若是𠵽，古黠切”及“𠵽，草𠵽，禮，稟𠵽之設”的“新添”。這二字都不用小圈劃開，可以認為都是“古黠切”的反切所表示的同音字。然而《新刊韻略》的轄韻儘管已有“古韻切”的刮小韻，卻未合併這些。《文場備要》更將“新添”表示換成小圈把𠵽、𠵽二字留在末尾位置，並在其後增補了“○叭，普八切，声也○鏹，查鏹切，切草器。剗，上同”。這正與《文場備要》的牌記中所說的“今復以諸韻參校，每一韻為增數字”相符合<sup>21</sup>。《新刊韻略》及其增補版的《文場備要》、《魁本》僅以突然在各韻末尾依次追加下去的形式進行增字，無論如何也不能稱為真正的增補改訂版，應該說畢竟祇是書商能做的工作。不過由於“重添”、“新添”等標記已無，初看易生

<sup>19</sup> 據《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可知該館亦藏有一本，刊年不詳。

<sup>20</sup> 原為狩谷棧齋的求古樓藏本。由藏書印記可知自淺野長祚、寺田望南傳下來，最後歸於楊守敬的觀海堂。有天保十五年（1844）梅堂（淺野長祚）的手書題跋，云“卷首有清周亮工賴古堂藏印及第二卷末韓人源龍在田印記”，然而是否周亮工的舊藏非常可疑。附帶說一下，此書亦著錄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為缺第五卷入聲的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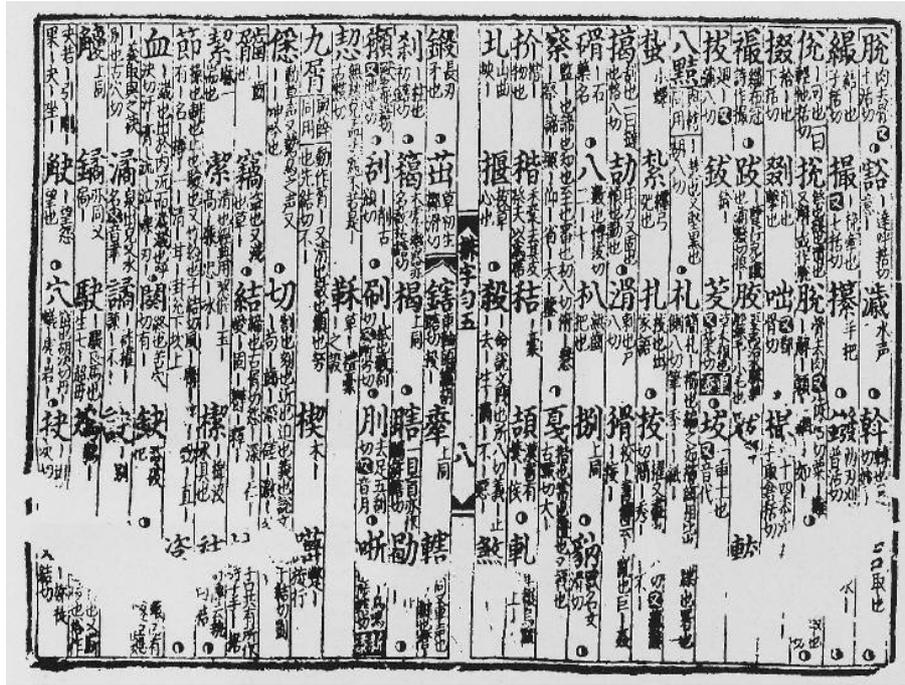
<sup>21</sup> 《文場備要排字禮部韻註》的卷首“分毫點畫正誤字樣”末尾有牌記，云“聖朝科試，舉子所將，一禮韻耳。然唯張禮部敬夫定本最善。今復以諸韻參校，每一韻為增數字，凡增三千餘字。釋焉而詳，擇焉而精。敬用梓行爲文場寸晷之助云”。此處提到的張敬夫本情況不明（錢大昕《養新錄》卷 13：“未知張禮部何時人耳”），亦應屬於《新刊韻略》系統。

誤解。楊守敬對於《魁本排字通併禮部韻註》說“文郁本有新添重添之字，此本無之。是又出文郁本之前”<sup>22</sup>，當然是錯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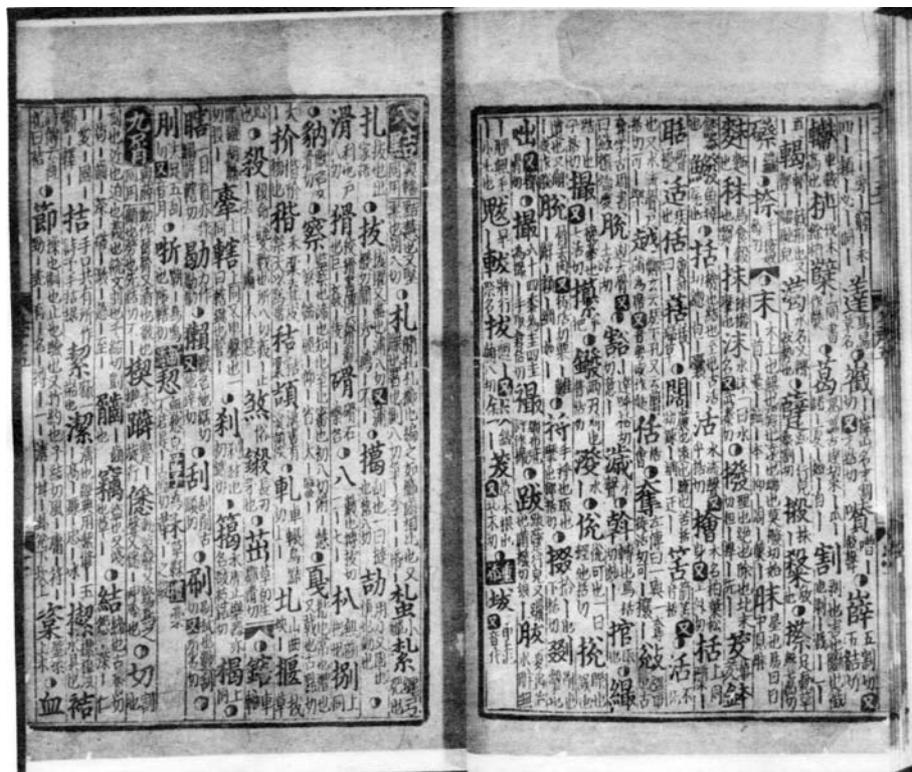
總之，作為金元間的科場參考書流行的“韻略”中，王文郁《新刊韻略》系統的書占有主流地位。那些書由民間書肆經手翻刻時，為增加商品價值進行了增字。莫高窟發現的“排字韻”是未經增字的版本，因此可以看作《文場備要》、《魁本》出現之前的較早時期的書。不管怎樣，莫高窟的殘片是從印刷地千里迢迢運到偏遠的敦煌，滿足了當地的需要的，當然不可能印刷於敦煌。不用說，以版心的“排字韻”作為該韻書的名稱也是不確切的，其具體名稱大概應是《排字新刊韻略》或《排字新刊禮部韻略》之類。我們從莫高窟發現的殘片，可知元代一百零六韻的官韻已流行全國，發揮了規範作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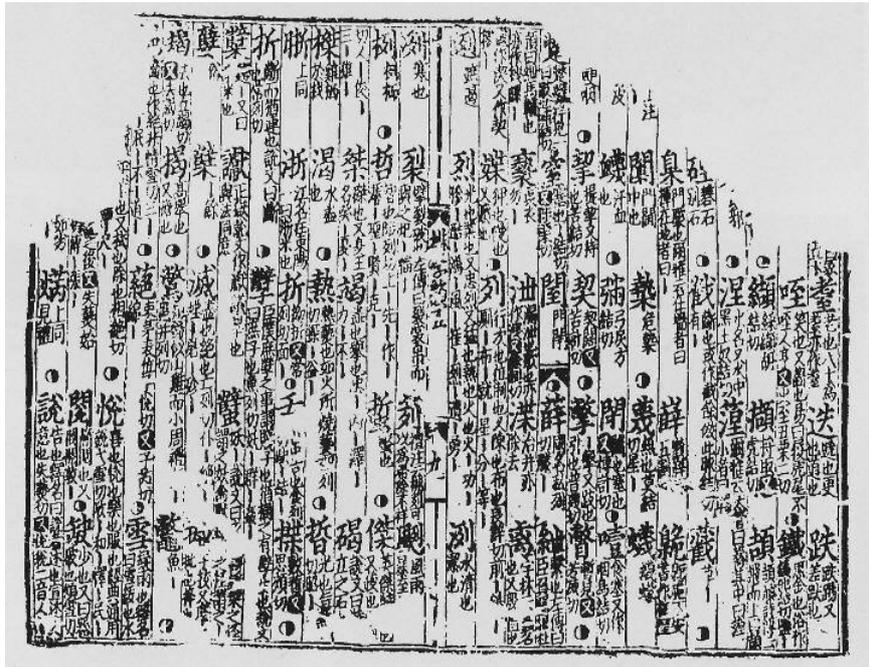
<sup>22</sup> 《日本訪書志》卷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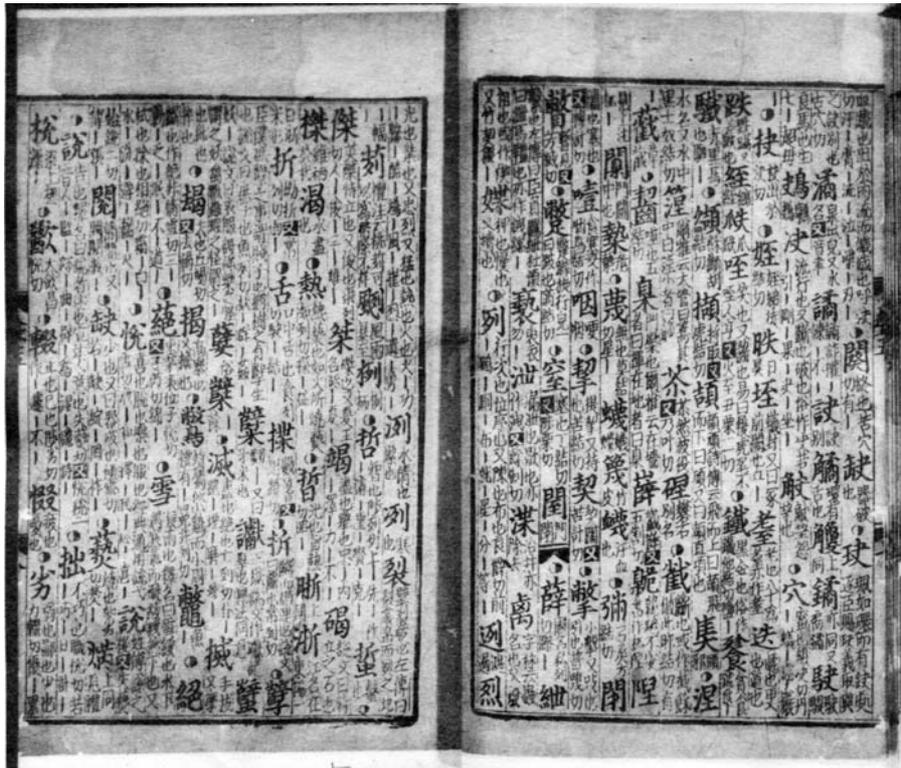
圖版（1）：「排字韻」第八葉



圖版二：王文郁『新刊韻略』第五卷入聲（部分）



圖版三：「排字韻」第九葉



圖版四：王文郁『新刊韻略』第五卷入聲（部分）